

編後語

民族主義的勃興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奇葩，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並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黑色的惡之花，給很多地方的人類社會帶來災難。人類付出了極大的努力，終於在歐美將民族主義納入到憲政主義的文明框架之中，不再使之為禍人間。然而，在東亞地區，狹隘的、狂熱的民族主義（或族群主義）依然甚囂塵上，綁架着各地的政治，危害着地區的和平與發展。

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欄目刊發了三篇文章，通過考察中日的歷史觀來反思狂熱民族主義的危險性。李朝津之文聚焦於1930至40年代的中日戰爭。在中國史學家（無論是身在大陸還是在台灣）的筆下，對中日戰爭的解釋大抵不超過「侵略與抵抗」範式，基本上強調日本對華侵略是其現代化戰略的內在組成部分之一，具有不可避免性。與此相反，很多日本學者儘管不否認對華戰爭的侵略性質，但致力於探究對華戰爭乃至太平洋戰爭的「非連續一貫性」，實際上是在細究中方和美方的「戰爭責任」。李朝津教授主張將中日戰爭置於現代化進程的宏大歷史背景下，來考察人類社會通過暴力擴張來尋求自身發展的非正當性。

呂玉新之文考察了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和右翼保守勢力的歷史根源，追溯到在德川幕府時代滋生的近代日本「國學」。日本「國學」構建了一個未被外來文明（指中華文明）污染過的、純潔無瑕的遠古本土文明，提出了日本民族是神國之民、具大和之魂並超越世上所有民族的種族優越論，進而狂熱地幻想「脫亞入歐」並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「武威」滌蕩劣等民族，主宰朝鮮、中國乃至整個亞洲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西方深刻地反省了社會達爾文主義，並且逐漸告別「暴力型」現代化之路之後，以「國學」為源流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流毒卻依然深植於日本社會，長期以來一直被當作純潔無瑕、極具優良特色的本土思想，不斷受到日本國民的追捧。這樣的國家，一旦被具有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人物所牽引，將國家導向與鄰為敵之路，都是歷史的悲哀，文明的倒退。

巧合的是，本期「學術論文」欄目刊發了周頌倫的文章，考察了福澤諭吉「文明論」中啟蒙主義與沙文主義並存的內在邏輯。福澤諭吉在日本現代化歷史中的地位眾所周知，但他從啟蒙主義推演出「脫亞入歐」和「東洋盟主論」並使其「文明論」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之思想基石的理路和影響，值得學術界細細深究。

在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欄目中，伊東貴之的文章關注中日對「南京大屠殺」的歷史記憶，並且引證溝口雄三的觀點，強調不盡準確的歷史記述「將感情記憶的非科學性引入歷史的科學性中，並以歷史之名義，合法地抹殺記憶，以達到將事件整體轉為非歷史化的目的」。伊東貴之提請中日歷史學家深思自己的歷史責任：儘管要不偏不倚地、一字不差地表述「真實的話」確實難以做到，但如果認為世上本無「真實」，一切都是「言說」，將歷史當作非紀實小說，就會走上永隔兩國相互理解的不歸之路。